

禾 实 年

王兴著

——农村工作实践与思考



甘当益民拓荒牛，
敢在难中唯实求；
力竭耕耘播富种，
们心自问无愧羞。

作者自题



1987 年作者(右 2)陪同国务院副秘书长
顾明同志(左 3)视察庄河县



1985 年作者(右 1)在獐家村蹲点时，
来到菜园与农民谈心

序

人的经历犹如一部史书，记载着生活、工作和事业，凝聚着喜忧、艰辛和经验。作为一位在领导岗位上奉献了40年的老同志，在他离职之后，不甘寂寞，勤奋笔耕，反思自己，向社会献上了一笔精神财富——《求实录》，为后来人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个思路，便于人们在今后事业中去借鉴，去探索。这种精神的确难能可贵。

学善同志曾在金州区工作了36年，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到市里。我和他有过长时间的工作接触，彼此间还是比较了解的。在看到他的这本《求实录》的手稿后，我有一种亲切和务实之感。这本书可算是学善同志几十年农村工作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的工作和生活体会。作者在农村工作这么多年，阅历是相当丰富的。他当过村支书、公社党委书记，又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熟知农村的一草一木，风俗人情。他经过了农村的一次又一次的变革，领导或参与过农村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当说农村的工作是很复杂的，于细微处体现着领导者的管理水平和创造精神。作者正是因为有这种经历，才使他“难忘往事”，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怀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写出了这本《求实录》。

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经验。这本《求实录》记录了作者的实践过程和体验。书中既有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又有农村经济工作的创见。而且对如何发展农村文教事业，如何理顺农村的干群关系，如何贯彻党在农村各项政策，农村干部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等具体问题，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体会。为解决农村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者从实际出发，写出了《要按县情办农业》的文章；抓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作者总结出《“双百分”竞赛的效应》的经验；发展工农业生产，作者谈了《最佳生产速度谈》的体会；做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作者明确提出《“红色染匠”与我们的干部》；如何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作者《赞“变压器”式的干部》等等，涉及农村工作的诸多方面，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针对性。文章形式不拘一格，语言朴实流畅，论述言简意赅，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研究农村工作的一些疑难问题。我想，如果作者不亲自参加农村工作实践，是写不出这样具体、务实的文章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求实和开拓精神。这本书之所以取名叫《求实录》，大概也是基于这种思考。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干部应该牢记这一点。然而，要想探索 and 掌握事物发展规律，不参加实践是不行的。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干部，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深入基层，通过实践求得工作方针或工作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认识。对此，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求实的精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许多的教训。十年动乱，搞假大空，使我们的事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如今搞现代化建设，切不可重蹈覆辙了。求实精神，不仅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也反映了党员干部的工作

— 1 —

责任感。

学善同志在离岗之后写了这本书，是可喜可贺的。我很高兴为他的这本书写序，并借此谈了我的一些感想。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体会也是很宝贵的，把它交给后来人品评，从中吸取和借鉴有价值的成份，是很有意义的。但愿大家能喜欢这本书，并从中得到启迪。

朱学善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我的经历

人生起步.....	(1)
走进火热的生活.....	(6)
在区和公社的日子里	(10)
到县里工作	(18)
探索求实的启示	(37)

我的体会

——思想政治工作篇——

新时期政工思路	(40)
“双百分”竞赛的效应	(43)
两种“倾向”谈	(45)
党员的为民观	(46)
治疗“恐右症”	(49)
法制之我见	(51)
人防工作的指导思想	(53)
民兵的地位	(55)

——公仆篇——

当好“父母官”	(58)
由一则民间故事想到的	
——就县长的讲话	(61)
“红色染匠”与我们的干部	(63)
有权切不可谋私	(65)
共产党员的致富观	(66)
为“官”的管理意识	
——学习列宁文章的一点体会	(68)
邪不压正	(72)
用人之鉴	(74)
从政切记廉洁	(77)

——正确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篇——

“不以规矩 难成方圆”	
——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体会	(80)
工农报酬差	(83)
坚持统分结合,搞好两层经营	(84)
按劳动成果计酬	(87)
我看“财政包干”	
——来自金县铸造厂的启示	(90)
谈横向经济联合要有“互利”的原则	(91)

——工作作风篇——

不实践不知蹲点好	(93)
上好劳动课	(98)

换位体验

——当农民一个月谈…………… (100)

学会跟自己“打官司”…………… (103)

善听逆耳之言…………… (105)

打好教育的基础

——关于金县教育工作的调查…………… (106)

——农科篇——

要按县情办农业…………… (109)

做科学种田的“自由人”

——学习《反杜林论》的一点体会…………… (125)

抓好农业商品生产…………… (129)

农田基本建设谈…………… (132)

要合理利用土地…………… (134)

关于蔬菜商品的特殊性…………… (142)

——改善工作方法篇——

赞“变压器”式的干部…………… (144)

如何落实工作任务…………… (145)

怎样对待“犟眼子”…………… (147)

最佳生产速度谈…………… (149)

劝君莫唱“空城计”…………… (150)

凡事切忌过头…………… (151)

知心与谈心…………… (152)

怎样吸取会议的营养…………… (154)

后记…………… (155)

我的经历

人生起步

1930年3月22日，我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县杏树屯镇东亮村(原猴儿石村)小丁家屯的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雇农家庭。兄弟姊妹八个，在兄弟中我排老四。

童年时期的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苦生活。平日是糠菜半年粮，从小就养成了吃饭时将掉在桌上米粒拣起来吃的习惯。古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这首诗，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家贫，逢年过节也吃不上节日的饭。春节时，能吃上三顿没有一点油腥味的萝卜丝馅饺子就算不错了。就是这样的饺子，也吃不够，总是不饱，常吃坏肚子。有时候看见地主家平时吃饺子，就回家问妈妈，他们为什么又过年了？在我五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听说扛活的哥哥买了二斤猪肉回家过年，把我乐坏了。于是，我穿着空壳棉袄、灯笼裤子，光着头，脚上拖着大人穿过的透风的鞋，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哥哥，抢着提那二斤猪肉。哥哥看我冻得鼻涕一把一把的，便从身上解下大围裙围在我头上，我顿时觉得象火烤似的，心里热乎乎的。

家里在处理事情上，往往分两派。父亲眼光远一些，因而常受到家里人孤立。母亲眼光近一些，就往往得到家里人的拥

护。有时，家里为吃一顿好一点的饭菜（其实也好不到哪去），又想少花钱而争吵。我记得有一年小丁家屯发生了猪瘟，有的家便将小猪崽白送给别人家养活，我们家在这种情况下，养了3头小猪，其中一头钻到炕洞里被火烧伤了耳朵，成了锯齿式，还搭拉着一块。每次我去放猪时，生怕别人看见讥笑。春节时，母亲主张杀一头猪吃肉。父亲说：“一头猪能换一斗苞米，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难过日子，好过年啊！”我们家里人都赞成父亲的主张，但最后还是拗不过他，把3头猪全部卖掉了。

母亲虽然在有些事上眼光近一些，但是在让我读书的问题上却比父亲看得远。母亲说：“穷死了也得让孩子念几年书，识几个字，不然受人欺负。”父亲说：“给人家放猪，不挣钱能带去一张嘴，不在自家吃饭就行啊！”最后，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还是去念书了。我虽然只读了五年书，但这对我后来的成长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一生行善，有两条裤子也能给别人一条，可谓“不求今世求来世”。他认为人生在世若是做了坏事，死后下阴曹地府，一定得受阎王爷惩罚。父亲的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使我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总愿“息事宁人”，见到受苦的人便生怜悯之心。

1940年3月，我和一帮小伙伴到伪卧龙屯会普通学堂念书。在读书期间，家里有时没有吃的，没有烧的，有时天冷没有衣服穿。如此下去，我不能上学了。虽然从学历上看我念了5年书，可实际上，只有二年半多一点时间。记得念书时，我有时没有带午饭，同班同学杨万东便送给我一片苞米面饼子吃，我非常感激，也因此使我们之间结下了友谊。

当时，全校师生经常参加“勤劳奉仕”活动。有时拾捡烧柴，我们的老师郝维宝知道我家境贫寒，就让学生把烧柴送给我家里。当时我想，这是老师对我的恩惠，是对穷学生的照顾和帮助。

童年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家贫，但是我们小孩子天真无邪，有时也玩得有趣和开心。记得村中有一位老头，外号叫“老海怪”。他每逢见到我们几个小男孩，就向我们借裤子穿，硬说他和老伴俩穿一条裤子。他出门时，老伴光着屁股在家里。他说着说着使用手抹着鼻子抽搐着，装出一付哭相，逗得我们转圈笑得前仰后合。有一次在海边钓鱼，他提出来和我们比赛，我们三个小男孩当然不能服气了。我们就暗中商量，各换一个长鱼杆，增加一倍数量鱼钩。在钓鱼时，别让他看见，各钓各的。后来一比，他的鱼笼里的鱼快满了，我们只钓了十几条鱼。于是，我们就暗中仿做他的鱼杆。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去钓鱼。我们学着他的钓法去钓，结果还是钓不过他。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让他在海滩上休息。我一声令下，我们三个人一起踞在他身上，有的胳膊他的脖子，有的胳膊腋窝，他笑得仰面滚动，手扒脚蹬。最后，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钓鱼的诀窍：鱼杆线系上横棍垂线同水深相等，水面波动，鱼饵随之活动，引鱼上钩。我们听后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大连在1945年8月15日光复后，学校的上课暂停了。我又到桃园村私塾馆学习了一个冬天。这私塾馆里有个蔡瘸子，是个“学生王”，随意欺负同学。当我去念书之后，因为个头高，又为人正直，他很在乎，再不敢欺负同学了。对此他心怀不满。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走到四处无人的北大沟时，突然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冲我而来，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你为什

么把我弟弟的对字本(春联本)给撕了?”。我听后一愣,心想事出有因,一定是蔡瘸子搞得鬼。那小伙子举手要打,我说你先别打,把事情弄明白再打也不晚。接着,我又平静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弟弟是一个老实孩子,我相信你弟弟是不会撒谎的,若是我真撕了,我该加倍挨打,毫无怨言地领受。请你回去问准,拿来我撕书的真凭实据,我明天就在这里等候你打我。从此之后,他不仅没有打我,反而向别人说:“这小子将来会有出息的,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因为生活困难,后来我就在家里挖树根。我挖树根,只要能挖下来,能劈下来就可以。我挖的树根总比别人多,镐头尖不知坏了多少次,扁担不知压断了多少条,挖的树根堆积起来象小山一样高。

1947年3月经同村的滕元永介绍,我给本村宁志宽家里扛了三个月活。姓宁的这个人挺会当家的,他上山看我们三个伙计干了多少活,用大围裙兜点熟花生给我们吃。我对姓刘的伙计说,这是东家借送花生之名,行监视我们干活之实。另一个伙计不同意,说这是东家好心送花生给咱们吃,你们还说三道四。这个伙计还经常在东家面前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就生气,找机会教训他。有一次,清除象粘糕一样粘的猪圈粪,我们狠狠往抬筐里装,我们两个人轮流换抬,就是不换他,干了一天,晚上睡觉时,他上不去炕了。后来一想,我们穷伙计赌气却便宜了东家,从此我们便“休战”了。三个伙计合好如初,还合伙编了一些讽刺东家的顺口溜。

有一天下雨,心里想今天可以不干活了。吃完早饭,东家说今天不能干别的活,可以去拣粪。我的心里非常不满意,但是手端人家碗,就得受人家管,给人家扛活真是身不由己啊,

但借此机会，我还是跑回家去一趟。

1947年国民党封锁旅大。当时老百姓吃粮非常困难。猴儿石屯为了护好秋，要找几个人打更，一宿给一斤豆饼，这个“差事”让我揽上了。一天夜里，老苗家菜园里的狗叫个不停。我们打更连续看了三遍也没有发现什么。我感到很奇怪，灵机一动，甩了一个石头，大喊一声：“我看见你了！快出来！”咳，这一招还真灵，那个贼误认为我真看见了，他撒腿就跑。我们随后就撵，他跑不远就被我撵上了。他回头一呲牙，象疯子一样扑过来，但被我们捺倒捉住。定睛一看，他手里提着的一条麻袋里装着几个茄子，从他憔悴的面孔看得出他是饿坏了。我鼻子一酸，顿生怜悯之心，最后将他放走。

大连解放后，为了生产自救，1948年关东署副主席韩光提出了大生产的号召。我们几个年轻人到小泰山去开荒。几天后，其他人都累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一镐一镐地刨。我饿了就吃点萝卜，有时喝点凉水，坚持开垦了六亩荒地，种上苞米和谷子，当年苞米谷子长得象浇油似的，比别人家苞米谷子深一色、高一头，粗一圈，乡亲们称为“天下第一田”。1947年秋，人民政府号召“反奸清算”，家里又分得四亩地，正好赶上风调雨顺，获得大丰收。我家第一次获得这样多的粮食，不仅吃的不愁了，而且还用这些粮食买了三间房子，从此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高兴极了。

这年秋天，勇家村召开青年会，因为我只顾忙于开荒种田，没有参加会议。村长刘全安不高兴，就派人把我找去，让我检讨。我就泰然自若地说，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就要响应关东公署领导的大生产的号召，我去开荒种田，是理所当然的，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是会支持和鼓励我的，你们也会感到我这样

做无可非议。最后，他们还是理解了我。

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我开始了新的人生。

走进火热的生活

1949年3月，在改造村政权时，中共杏树屯区委组织委员杨学忠物色猴儿石村村长时，对其他村干部说，王学善同志年纪轻，为人正派，有点文化，可以列为候选对象。我当时有一些自馁思想，认为当村长得是有钱、有文化、有名气的人干的，而我是个毛孩子，能行吗？在选村长头一天晚上，我一宿未睡好。第二天早晨我准备参加选举时，母亲说，咱不能当这个“差”，你还没有当上，就一宿未睡好，若是当上了，还不知几宿睡不好觉，咱们不是当官的材料啊！

自尊心是进步之母，自贱心是堕落之源，自尊心不可无，自贱心不可有。在选举村长会上，我临场不怯，讲了关于全村春季生产方面的工作想法，讲得挺流利，思路也清晰。大家一致反映说，这个小伙子还行，童声童气，有口才，有头脑，可以让他当村长。就这样，在我19岁时就被选上了村长，我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当村长之后，根据区委的指示搞“文化募捐”，盖村文化站，动员富裕人家有钱出钱，有建筑材料出建筑材料。当我们村正在筹建时，区里筹措资金准备盖区文化俱乐部，要抽调各村盖文化站的建筑材料。于是，我们村干部搞“文化募捐”就不太积极了，结果区上俱乐部建好了，村文化站却没有建起来。几年以后，我们又经努力，才把猴儿石村文化站盖起来。

接着我又组织农民搞生产，发放政府农业贷款，帮助农民

借种子，组织大家把地种上去。希望秋天有个好收成。没有想到，这年夏天，刮了半个月台风，把一片好庄稼全部刮坏了，苞米被刮得只剩一根杆。结果，秋天裸粒无收。只是地瓜、花生等就地爬蔓作物还有些收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组织农民生产自救，搞副业生产。政府又拨发了救济款，加上1948年大丰收底子，这年的困难就挺过来了。

1949年6月中旬，我参加了金县青年干部班学习。这个班有将近70人，不少是知识分子，学习三个月。我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毛泽东著作。这些内容原来在我头脑中是空白，这次学习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这对个人思想进步促进很大。三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一天也没有耽误，在结业回村时，我感到好象走到了一个新天地，思想上也有了好多新的认识和想法，觉得自己充实多了。从此之后，我也经常坚持自学毛泽东的著作。

1949年6月20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我同猴儿石村农会主任丁喜洪由区长王连仲和猴儿石村渔业合作社主任孙福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拿笔填写入党申请书时，我心情格外激动，手颤抖着，墨水把纸都渍透了。当时介绍人要求我们入党的人要保密，在家里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直到10月1日，我们党由地下转入公开。

1948年春季，区委组织一些人搞农村经济调查，每家都填一张经济状况表，为1949年底旅大地区土地调剂工作做准备。因为当时人们不知道这次调查的意图，一般填写的比较真实，经群众审查，其准确性是比较高的。这就是实行土地调剂

和划阶级成份的依据。之后，还宣传划定阶级成份政策。如地主、富农解放前连续三年剥削，解放后三年其中有一年剥削就定为地主、富农成份。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就是地主本身不劳动，富农本身劳动。县里还派县委办公室秘书邵有专到我们猴儿石村指导“土调”。划分阶级成份采取三榜定案的方法：第一榜公布后，让群众和本人提出意见，经过修改后公布第二榜，再让群众和本人提出意见，并且向群众宣布有意见可以提，第三榜公布就定案了。

“土调”开始后，发动贫下中农封了地主、富农的门，分土地、分车马和农具等。在这过程中，根据县里指示：有的地主、富农在解放后经济被削弱可以定地主、富农相当中农，但政治待遇还是按地主、富农对待。“土调”快要结束时，县里又提出来“土调”主要打击封建剥削，对拥有果树、渔业者可以不按封建性质打击对待，因经营果树、渔业被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改为农业资本家或上中农。

“土调”是消灭封建势力的一场革命，有的地主、富农一看他们的末日来临，就采取种种手段想蒙混过关。如对村干部行贿，搞美人计等，企图拉拢干部为他们办事。当时钟家屯地主送给一个村干部一些东西，这位村干部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当时象炸锅一样，什么话没说，就命令立即把东西退回去。

在“土调”时，忙得我脚后跟打后脑勺，成宿达夜不睡觉，满身是劲，从不叫苦。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到区里开会，晚上往回走，我穿了一双苏军战士的掉底破皮鞋，钉子扎破了脚，无奈只好用手捧着鞋，光着脚往村里跑。

“土调”是革命大熔炉，经过这一工作过程我感到进一步明确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根子扎得比较深，对阶